

从公园古建到工人文化宫,从24小时书房到城市记忆空间……城市书房成为家门口的“精神栖息地”

城市书房如何持久“芬芳”?

本报记者 肖婕妤

3月10日傍晚时分,北京市朝阳区的首开书院城市记忆书房亮起了灯。光线落在刘女士的书本上,她揉了揉眼睛,又继续翻看着教材。这是她近一个月第5次来这里自习,为下个月的职业资格考做准备。

类似的场景,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悄然上演。近日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走访北京数家城市书房,探访这一新兴文化空间的运行情况,以及发展中面临的挑战。

各类书房扎根市井,家门口的文化空间触手可及

春日午后,昌平公园的湖水微波荡漾,灰砖蓝瓦的弘文阁古色古香。推门而入,墨香与草木香交织,这里便是昌平城市书房(弘文阁)。胡桃木色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排列,长桌前坐满了沉浸于阅读的读者。自助借还机旁,张女士把书放在图书感应区,点击屏幕“确认还书”,几秒钟便顺利完成归还。“来公园遛弯偶然发现这里的,现在每周周末都来,借还书不用专门跑图书馆,特别方便。”她说。

昌平城市书房(弘文阁)负责人芮园告诉记者,这座仿清代建筑在关闭多年后,于2024年9月重新开放。阁内空间各有分工,一楼是昌平政协文史馆与借阅区、自习区,二楼是茶饮消费区,环廊墙上挂着定期更新的书画展。“馆藏1万多册图书,有不少本土文史资料,市民可在阅读中感受昌平本土的文化底蕴。”

城市的另一头,朝阳区工人文化宫6层的匠书阁同样人气十足。近1000平方米的场地内,1.5万余册藏书涵盖历史、文学、少儿等多个领域。靠窗的自习区座无虚席,绘本区里一位奶奶正轻声给孙女读绘本。

这座藏在工人文化宫里的城市书房,开业仅5个月,借阅量就达1万余册,位居朝阳区首位。“除了阅读需求大,自习的需求更是超出预期。”据工作人员马欢介绍,匠书阁每

今年2月1日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,全民阅读迈入法治保障的新阶段。当阅读空间突破传统边界,当技术为书香插上翅膀,一场关于阅读的深层变革正在发生。即日起,文化·开卷版推出“全民阅读新图景”系列报道,聚焦图书馆、城市书房等各类阅读空间的新探索,记录《条例》落地之后,书香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与时代脉动。

编者按

天平均接待300人,其中七八十人都是专程来自习的。“这儿宽敞,接水上厕所都方便,主要还免费。”家住附近的汪先生近期准备找工作,这个月每天都来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

而社区里的24小时城市书房,更让上班族体会到家门口的方便。在朝阳区安贞街道24小时城市书房内,临近晚上11点,王先生收拾好背包准备回家,从书房步行到家不过10分钟。他直言,24小时开放的模式对上班族格外友好,想来随时都能来。“哪怕只是发呆放空,都觉得松弛又疗愈,仿佛回到大学泡图书馆的时光。”

近年来,北京市大力推进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建设,将城市书房作为重要配套,全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从企业打造的首开书院城市记忆书房,到酒店配套的禧园城市书屋,再到无人值守的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……形态各异的城市书房,以免费开放、便捷服务为核心,成为市民缓解压力、滋养心灵的“精神栖息地”。

空间与运营的双重挑战

在感受城市书房带来的温暖与便利之余,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,这些承载着市民文化期待的方寸空间,正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。

“周末来晚了就没座了,只能站着看,希望增加点可移动的小凳子。”昌平城市书房读者张女士告诉记者。在回观文化艺术中心城市书房里自习的李女士也表达了类似诉求:“有次我去上趟厕所,回来凳子就没了,找了半天才在角落找到一张椅子。”

不仅白天一座难求,深夜的城市书房同样

人气不减。晚上11点,安贞街道24小时城市书房内依然有十来个人伏案学习。“这里很方便,但空间小,社区居民多,一个书屋不够用。”王先生表示。针对这一问题,该书负责人告诉记者,在天气和空间允许的情况下,未来计划在馆外的区域增设桌椅,进一步拓展空间,以更好地满足周边居民的阅读与学习需求。

座位紧张之外,噪音问题也给自习读者带来了一定困扰。记者在回观文化艺术中心3层的城市书房看到,馆内多处已张贴“保持安静”的标识,但由于楼宇空间贯通,一层的声音容易传导至楼上。“周末孩子比较多,难免会有跑动、嬉闹的声音,我们也能理解。”正在备考的赵先生表示,为了不被打扰,他通常会佩戴降噪耳机自习。

而对运营而言,保证城市书房的常态化开放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。芮园介绍,昌平城市书房实行全年无休服务,现有工作人员需要兼顾图书整理、秩序维护、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。为更好保障服务质量,书房会通过统筹调配人员、招募志愿者等方式补充力量,全力为读者营造稳定、舒适的阅读环境。

“电商冲击大,我们得不断探索新的运营模式,实现增收。”匠书阁工作人员马欢对记者说。面对当下实体书店行业普遍的经营压力,首开书院工作人员表示,“希望政府、企业、企业协同发力,共同为周边百姓营造一个高品质的‘城市文化新场景’”。

多元探索让城市书房持久“芬芳”

面对困境,城市书房的未来路在何方?

多位受访专家纷纷开出“药方”。

针对读者反映最集中的“自习座位不足”问题,暨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郑焕钊指出,根源在于书房功能定位滞后于实际需求。“平衡之策在于动态调整。”他建议,可通过用户数据监测,在需求高峰时段启用活动区、走廊等灵活空间增设临时座位,并依据不同类型书房的定位进行差异化配置。

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(中国传媒大学)主任彭健则从空间设计角度提出“立体复合使用”概念。“书架和桌椅都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,同时考虑时段的复合使用,把工作日、周末、白天和晚上的空间更好地区隔出来。”针对噪音干扰问题,彭健建议设置动静分区,形成过渡空间,辅以技术手段,并加上一些人工提示,多管齐下营造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。

空间优化之外,运营模式的创新同样关键。为缓解人员短缺困境,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夏云娇建议:“可以招募退休教师、在校大学生等文化志愿者,加强培训并构建激励机制。有条件的可搭建统一智慧管理平台,实现门禁、借还、安防一体化管控,推行无人值守、远程监管模式。”

谈及城市书房的长远发展,夏云娇建议,未来要推动服务供给多元化,适配不同人群需求;通过多样化布局丰富服务场景,将阅读、自习、活动、展示、休闲等功能融于一体,让“15分钟阅读圈”从“有场所”升级为“有品质、有温度”。

“在建设运营上可探索‘分布式文化节点’的发展模式,以阅读为基础媒介,在城市社区网络中布局若干小而精的文化空间。”郑焕钊建议,通过整合文化交流、公共活动与社会协作功能,使书房不仅提供知识资源,更成为连接居民、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和沉淀地方记忆的重要平台。

全民阅读新图景①



校园品书香

3月12日,山东省高密市第五中学,图书馆里书香正浓
本报通讯员 李海涛 摄

独到眼光下的文学批评

刘剑

我有一个文化理念:读作品也是在读作家,写北漂也是在写人生。翻开全秋生的《北漂者说·读书记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),恍如踏入了一座由文字构筑的双重镜像的百草园。一面是职业编辑对刘绍棠、欧阳山、草明等作家作品的精微剖析,一面是北漂者以20余年灵魂漂泊的文化积淀勾勒出的独特文学漫游。

他读懂了刘绍棠。一部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,让书评者在恍惚之中“就像一位穿越时空隧道的游客”,跟随作者的笔触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燕赵大地。书评的诗意文字,远离了刻板的解读,将作者中学时代就崇拜的“天才神童”,拉近至触摸得到的距离,亲切而自然。作为资深文学编辑,他对评论名家作品可谓独具慧眼、得心应手。

他读懂了欧阳山。一部杂文集《广语丝》,让评论者在阅读之中“像是一条干渴的鱼儿游进了文字的大海,聆听着欧阳老远去的声音一直溯流而上……”这篇散文诗般的语言,与欧阳山美的文字交织得如此自然,也大大拉升了读者的兴趣。他谈的不光是文字,谈的也是人生。

他读懂了王十月《无色界》中的主人公,“一边自强不息一边舔舐流血的伤口,在喧嚣的都市里寻找,在灵魂的家园里放逐。”他读懂了聂鑫森《书鱼馆主》中一群文化人和底层小人物,发出了“真正的读书人还有几个”的天问。他读懂了野莽《诸客列传》中的文人墨客,也读懂了与野莽的文学缘分出自何方。

全秋生文学评论的魅力,根植于其编辑、作家、评论家三重身份的深度融合。编辑的“后台视角”,作家的“共情笔触”,评论家的“独到眼光”,共同熔铸了“有温度的批评”。

全秋生身上所具备的三重身份,让我想到了三棱镜的功用,将编辑家的洞察与作家的共情,升华为评论家的“文学即人学”的深度评述,折射出多维度的光泽,有编辑的专业冷静,有作家的生命热度,最终又凝结为评论家的理性思考。

这部厚重的文学评论集,最终在城乡裂变、理想与现实碰撞的鸿沟上,架起一道由文学之光构筑的虹桥。桥的此岸是北漂者失落的乡土根脉与编辑案头的繁复文稿,桥的彼岸是他在文学圣殿中以评论为砖瓦,奋力重构的精神家园。他评的是书,说的是人,照见的是时代洪流中个体灵魂的漂泊与坚守。

词语考古致敬劳动

兰善清

恰如著者詹船海此前在广州一次工会读书分享会上表达的“读词、明史、致匠心”,他新近出版的《中华词语考记》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),确实完好抵达了这一境界。继他的《典籍里的中国工匠》之后,这本力作一经问世便征服读者,荣登《中华读书报》2026年新年之初的好书推荐榜。

词语是人类创造的结晶,当它从呼啸的时间长风里逐渐凝固为符号,当符号成为常用工具,曾经的温度退去,习焉不察。詹船海从人之所以为人,人之所以有手有足,人之所以有劳动,人之所以有衣、食、住、行几大篇章入手,说古道今,徐徐引导人们怀想曾经的一路历程,重温我们的智慧温度,回望词语照亮劳动闪现的圣光。往事重置,细节跳出,词语的大千世界被激活。

从汗牛充栋的词语中,詹船海撷取今天的生活常用词“脑洞大开”“抓”“高手”“模范”“成器”等加以拆解分析,“人之初”的几个重要节点就全部道了出来;从“日月如梭”“好色”“酝酿”“分配”“夯实”“栋梁”“康庄大道”“见风使舵”等词语,道出人们何以有衣食住行。原来我们的根脉从手足开始,从心灵手巧起步,从燃起一炉火借力外物,从耕耘行远而从心所欲,“明史”和“致匠心”的立意,经此叙事,已然达成。

《中华词语考记》在学术上下足了功夫,作者以真实可考的讲述,还原“词”里的博大精深。可他的文笔又是轻松豁达的,众口咸宜。比方讲述“织机”这章,从“机”到“机械”“机器”的词语内涵辨析到纺织水平的日新月异,把词语里的穿衣之往事讲得极其丰富,绵密精深,同时又非常注意浅出,引用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《魏书》《西京杂记》《天工开物》《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》等典籍及学术著作,都适可而止,旨在把文史资料说活说透。

可以说,这本书所做的词语考古,是致敬劳动精神的崇高方式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书写工人家庭故事

本报讯(记者苏墨)近日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好好的时光》面世。这部知名编剧郝岩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,以细腻笔触聚焦大时代背景下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,深情书写工人家庭的温暖坚守与人间烟火里的质朴幸福。

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起点,讲述了机械厂工人庄先进带着两儿一女,与歌舞团演员苏小曼组建新家庭的故事。作品以近40年的时代变迁为底色,将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阵痛,融入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、悲欢离合之中。父母的坚守、子女的成长、邻里间的牵绊,在粗砺而滚烫的生活里徐徐展开。书中人物带着“咬碎牙也要把日子过好”的倔强劲,用幽默与宽容化解生活的苦涩,以普通人的坚持与奋争,映照出波澜壮阔的大时代,也最终收获了内心渴望的朴素幸福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以“小家庭”为切口,照见“大时代”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与情感韧性。郝岩以幽默为骨、以温情为魂,书写出一部关于爱、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国民故事,在烟火日常中照见人心,在平凡坚守里读懂时光。

江苏淮安: 市民文庙淘书



3月7日,江苏淮安,市民在清江文庙旧书摊位前选购书籍。

淮安文庙旧书集市有数十年历史,以旧书为主,也有古玩、字画等,是兼具文化怀旧与淘书乐趣的露天市场。

文庙旧书集市一般周末上午开放,是淮安本地及周边阅读爱好者的固定打卡点。节假日集市通常开放时间延长,规模更大,人气也更旺。

周长国 摄/视觉中国

“在场”与“远行”之间

——读生态保护题材长篇报告文学《大江长卷》有感

邱振刚

知名作家凌翼的生态保护题材长篇报告文学《大江长卷》(江西高校出版社),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江西长滕港环境治理的艰难历程,并在作者沿着长江从三江源到崇明岛的万里之行的映照下,建构出一种独特的生态写作范式——在“在场”的沉浸与“远行”的超越之间,寻找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新视角。

“在场”是这部作品最为动人的底色。作者生于斯长于斯,对长滕港的一草一木、一水一鱼有着近乎本能的感知。这种根植于成长记忆的在地性,使得叙述摆脱了冰冷的数字和空洞的口号,取而代之的是带着体温的细节:老渔民讲述江鱼品种退化的怅惘,孩童在重新变清的河岸边嬉戏的身影,环保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疲惫。这种“在场”不是旁观者的短暂停留,而是血肉相连的深度介入,让读者得以透过当地居民的眼睛,看到环境

变迁最真实的肌理——不仅是水质指标的改善,更是生活方式的变迁、社区记忆的重塑与生态意识的觉醒。

然而,《大江长卷》并未停留在地方性的叙事中。作者远赴三江源的那场“远行”,最后的成文尽管篇幅不长,但却成为全书视野转换的关键节点。站在长江的源头,俯瞰这条母亲河6000多公里的蜿蜒旅程,长滕港从一个孤立的地点,变成了宏大生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三江源的纯净与脆弱,与下游水环境的治理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:源头每一滴水的命运,都关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;而下游每一处污染的治理,也是对源头清澈的承诺与回馈。作者的步履还来到了丹江口水库、长江入海口崇明岛等地点,作品中通过对这些地方生态治理过程的观察,使得整个长江水质保护的成果获得了极具说服力的生动呈现。作品的这种结构绝非简单的场景拼接,而是一种深刻的认知隐喻:每一滴长滕港的水,都映照着整条长江的命运;每一处江段的治理,都牵动着流域

的神经末梢。我们看到的,是局部与整体如何通过水的循环,构成了一个呼吸与共的生命共同体。

《大江长卷》中这种“在场与远行之间”的张力,恰恰构成了作者独特的生态思考维度。一方面,作者坚守“在场”的视角,坚信真正的环境关怀必须始于脚下,源于对具体土地与人群的深刻理解;另一方面,通过“远行”,作者获得了将局部置于整体中审视的能力,揭示出长滕港治理不仅关乎一城一地的宜居,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微观实践,是人类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地方性努力。

这种双重视野的切换,打破了环境写作中常见的两种局限:要么陷入地方经验而缺乏全局视野,要么空谈宏观理念而失却生活温度。作者巧妙地在两者间建立联系,让我们看到长滕港的渔民与三江源的牧民、崇明岛的码头建设者,虽然地理相隔千里,却因同一条大江而命运相连;让我们理解,家门口的河流治理,本质上是在参与

一场关乎整个流域乃至地球生态健康的共同行动。

在文学表达上,这种“在场与远行”的结构安排,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。当读者跟随作者从长滕港走向三江源、崇明岛,再带着江之头、江之尾的启示回归长江中游的治理现场,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段旅程的记录,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的转变——学会在看见树木的同时也看见森林,在关注身边环境的同时,理解它在更大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与意义。

《大江长卷》通过这种在位移中展开的空间叙事,最终指向一种更为成熟的生态意识:真正的环境保护,既需要“在场”的深耕——对本土生态的细致观察、对社区参与的推动、对地方知识的尊重;也需要“远行”的视野——理解生态系统的整体性、关注跨区域的环境保护职责、培养全球性的责任意识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一条江河的治理故事,更提供了一种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:我们必须在扎根与远眺之间,在具体与抽象之间,在地方与全球之间,不断寻找平衡与连接。

合上《大江长卷》,留在读者心中的,或许正是这种辩证的智慧:保护好门前的河流,需要心怀整条大江;关爱整条大江,必须从门前的河流开始。在“在场”与“远行”之间,我们看到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微观实践与宏观图景,也看到了生态写作的新可能——它既深情又理性,既具体又开阔,既属于一地,又关乎天下。